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2104001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

屈宏,梁闪闪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毛泽东指示下,新四军部队挺进华中地区,开辟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和新四军部队的大力协助下,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工作,主要包括: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新政权、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大生产运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这些举措不仅使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政治上享受着空前的民主与自由,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和提升,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全面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巩固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4-0001-05

华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江淮河汉之间,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北至陇海,包括了江苏省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的大部分,以及河南、浙江的一部分,面积近60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近六千余万,包括苏中、苏北、苏南、淮南、淮北、鄂豫皖区、皖中及浙东八大战略区。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作出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指示新四军部队深入华中地区,逐渐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有力领导和新四军部队的大力协助下,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同国民党军队的合作,193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共产党所属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专门负责领导新四军和东南各省党的工作。从1938

年2月至6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要求新四军抓紧有利时机,主动深入敌后,依靠广大群众,在大江南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创立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向东作战,直逼京沪,向北发展,进入苏北、皖东。但由于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方针指导以及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的右倾思想影响,在抗战初期,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立工作并未有效开展。

1938年9月到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正确方针,撤销了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改东南分局为东南局,新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原局领导下,华中新四军部队积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摩擦,接连取得反顽斗争胜利,先后建立发展了皖东、豫皖苏边区、皖东北、豫鄂边区、苏南、皖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1941年4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加紧各根据地建设,创立了浙东抗日根据地。

到1941年底,华中根据地面积达到4.5万余

收稿日期:2021-04-12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18JZD002);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L19WTB019)。

作者简介:屈宏(1978—),男,山西太原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共党史。

平方公里,人口约1500万,初步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但由于各根据地建立不久,广大群众尚未普遍深入发动起来,根据地政权尚未巩固。为了坚持敌后抗战,渡过难关,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华中局在1942年1月至3月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全面布置了根据地建设工作,要求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努力完成政权改造、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及文化教育等各项任务。由此,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工作,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新政权

华中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以前,在华中地区广大乡村社会,国民党和地主豪绅通过实施严密的保甲制度,加紧对人民的控制和剥削,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如何巩固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根据地建设的头等重要任务。“只有大多数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1]因此,抓紧改造旧政权,建立“三三制”的基层抗日民主新政权,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战,是华中根据地建设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发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2]一文,首先提出了“三三制”,即在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中国共产党同各阶级的联合执政。根据地各级民主政府实行委员制、代表会议制,进行普遍的选举,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除去投降分子、顽固的反共分子外,非共产党人员,不管有无党派关系及属于何党何派,只要愿意抗日并愿与共产党合作就可以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华中各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刘少奇和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下,大力进行了民主改造政权的工作。1940年5月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各地普遍建立了中共基层组织,成立了区乡政府,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按照“三三制”原则吸收开明士绅和部分进步的旧政府人员参加各级政权机关工作。鄂豫边区经过3次乡保民选,再经边区总选,召开了第一次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对旧政权进行了彻底改造,建立起了各抗日阶层联合的新民主政权。

到1944年,华中抗日根据地已建立苏中区、淮南区、苏北区、淮北区、鄂豫皖区、苏南区、皖中区等七个行政公署和浙东军政民联合办事处,在各根据地成立了各级参议会和代表会。“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始普遍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4年,淮北区路东14个县,已经有8个县进行了县选,正式成立了各县参议会及行政委员会,其他6个县也成立了临时参议会;淮北基本区636乡,有330乡实行乡选建立乡代表制度;盐阜区890乡中已实行乡选的占520乡。^[3]这些参议会、代表会以及各级政府的行政委员会,均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由各抗日阶层的代表共同组建。如,淮北路东7个县参议会共有458名参议员,就阶级成分而言,有雇工12人,贫农71人,中农119人,富农70人,地主130人,商人17人,其他39人。淮北区泗南县参议员75人,共产党员占27人。^{[3]564}

“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形式,是适应抗战建国需要的新政权形式。刘少奇曾说,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只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抗日,一件是民主。^[4]正是由于对封建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才空前享有了未曾有过的民主权利,有了参政议政权,加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不仅是一般抗日的地主雇主阶层有权参政,而且历来饱受封建压迫歧视的广大工农群众,也首次普遍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够参加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吸纳根据地民众积极参政议政,大大提高了华中各阶层人民抗战的积极性,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开展减租减息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共中央率先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要改善人民生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5]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6]号召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42年,中共中央华中局确定以发动群众、

减租减息为中心,集中力量,抓紧反“扫荡”间隙和夏收秋收季节,按照中心区、边缘区和游击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有步骤地、大胆放手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坚决实行减租减息。1942年3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华中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和新四军各部抽调大批干部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进行社会经济情况和阶级关系的调查研究,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减租减息的重大意义,依据政府的政策法规,组织农民开展评租、减租、退租、交租和换约等活动。

通过有力的宣传动员和组织调查工作,华中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政策,贫雇农收入有了较大增长,土地不再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私有物,开始向普通农民手中流转,对于巩固根据地建设和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苏北淮海区泗阳县王集镇腰庄村农民杨继成,抗战前全家有5口人,种自田5亩,佃田30亩,但由于地主的残酷剥削,全家生活仍异常艰难。在冬季无钱买布,父子4人只得合穿一件破棉袄。1940年抗日民主新政府成立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杨家三代八十多年的穷苦生活才第一次得到改善。不仅还清了几十年来从未还清过的欠债,还新买下17亩地,全年扣除田租外,粮食还有大量结余,并存下现金4000元。^{[3]565}

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相较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人民生活负担大为减轻,与国统区和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如,苏中区宝应县曹甸一带,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种苛捐杂税共计达51种之多,几乎占人民全年收获量的一半。但当该地区抗日民主新政府建立后,人民就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各种苛捐杂税一律取消,人民负担仅田赋、公粮两项,平均只占7%,较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民负担减轻了7倍。^{[3]566}截至1944年7月,华中各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公粮、田赋负担与其总收入量的百分比,仅以苏中区为例,贫农为3%,中农为3.5%,富农为4%,地主为10%。^{[3]560}华中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大致如此。虽然受到严峻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国民党不断挑起的反共摩擦影响,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华中根据地人民生活水平仍逐年显著提高。

减租减息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解除了农民身上

的封建压迫,极大地解放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参战热忱。由于既实行减租减息又实行交租交息,充分照顾了各阶层利益,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效团结了各阶层一致抗战。

四、组织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由于日军不断发动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加之国民党顽固派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军民生活极为困苦。因此,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解决根据地军民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的一项基本政策。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各根据地军民,于1942年开始了以改善生活为主的生产运动,1943年开展了以自给为目的的生产运动,1944年又掀起群众性的大生产热潮,始终把发展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从而为赢得战争胜利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1943年11月,毛泽东发表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把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7]阐明了大生产运动的方向,规定了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响应毛泽东同志“组织起来”的号召,组织农村劳动互助,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政机关和新四军各部队派出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宣传政策,培养典型,帮助农民制定生产计划,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合作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1944年,单淮南、苏北两抗日根据地,就组织41万余劳动力,成立了24000余个劳动互助组。^{[3]566}

由于有效的组织动员,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成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人民的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敌占区人民的深受日军铁蹄践踏之苦和国统区人民深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压迫剥削之苦相比,华中各根据地人民生活水平相较抗战前逐步上升。如,1944年在苏北盐阜区淮安县大石庄村,全村共有35户人家,其中富农1户,中农15户(其中5户由贫农上升,2户由雇农上升),贫农14户(其中9户由雇农上升),雇农5户。全村过去有8户外出逃荒讨饭,中农以下吃油、灯油、衣服均缺,一到黑夜,全庄找不到

灯火。但当根据地新政府建立后,不仅没有外出逃荒的,而且家家晚上都点灯做活,为部队缝制军衣军鞋,开展纺织生产,普通农民一年中能买 10 斤至 30 斤吃油和灯油,添置 2 至 3 套新衣。^{[3]567-568}

兴修水利,开展水利工程建设也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主要内容。华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虽为全国水利最好,农产最丰饶的地区,但也常年遭受海啸洪水侵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1940 年华中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新政权建立后,便组织军民开展水利建设,兴修和改建各种水利工程,治理水患灾害。如,皖中抗日根据地的黄丝滩江坝外滩崩岸严重,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此,1943 年皖中行署成立了皖中水利委员会,专门负责统筹皖中根据地的水利建设。在 1943 年到 1944 年间,皖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部队多次打退日军的轰炸和进攻,组织数十万人工成功修筑了黄丝滩新江堤。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沿海群众常年受到海啸袭击,严重影响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在新四军第 3 师师长、苏北区党委书记黄克诚的大力支持下,1941 年阜宁县县长宋乃德领导军民修筑了长达 45 公里的“宋公堤”,共动员组织 40 万人工,耗费工程费 2 亿余元,使阜东十几万人民,数百万亩良田获得保障。自 1940 年秋至 1943 年春,华中各根据地军民共筑圩堤 818 公里,开浚大小河流、水道 3 370 公里;筑圩堤工程计土方 245 万立方丈,组织人工 424 万;开河工程计土方 210 万立方丈,组织人工 320 万;工程费总计 4 亿元,使华中 1 000 万人民生命财产有了保证,1 100 余万亩土地恢复生产。^{[3]568-569}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有力领导和新四军部队的大力协助下,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在战争烽火中依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有效地粉碎了日伪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华中根据地经济建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改善了根据地民生,人民群众生活大为改观,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保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在敌后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原因。

五、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1937 年 8 月 25 日,毛泽东在陕北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指出,要施行“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

程”。^{[2]356}因此,大力发展抗日民主教育,提高人民的政治水平和政治觉悟,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抗日民主政府的有效努力,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多种文化教育方式并存的独具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抗日根据地教育模式,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群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参战积极性。

在学校教育方面,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学校数量相较抗战前有很大的增加,不仅较好地普及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也有所扩展。据 1944 年初统计,华中各根据地共有中等学校 124 所,教职员 1 272 人,学生 18 478 人。小学校有 5 368 所,教职员 11 389 人,学生 40.1 万余人。^{[3]571}学校教育实施抗战与民主的教育,采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群众相结合。

在社会教育方面,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主要在每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间的农闲时节举办冬学运动,使人民群众能够普遍地接受文化教育。各地冬学主要由各抗日根据地政府指导开展,由地方士绅以及群众团体赞助主持。所学内容包括文化知识字课、抗战道理、政治军事时事等。根据地民众学习情绪甚高,在 1943 年冬学运动中,仅苏中、苏北、淮北抗日根据地受教育者就达到 48 万人,淮南抗日根据地仅培养冬学干部就有 23 132 人,其他抗日根据地亦均取得相当大的成效。到抗战结束时,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均已举办了 4 次冬学运动;鄂豫皖区、皖中、苏南也均举办了 3 次。

华中各根据地还通过戏剧运动、乘凉讲座、农村剧团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普及教育,丰富人民群众的娱乐生活。如,1944 年 1 月中旬,淮南路东专署举行了民间艺人大会,到会擅长各种地方戏的民间艺人代表有 173 人,散会后即由党政机关、剧团领导分散到路东各县区开展戏剧运动。经过先后三个月的活动,成立农村戏剧团 300 个,共涌现约 1 500 名民间艺人。^{[3]571}这些戏剧活动以服务抗战大局为宗旨,采取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通过自导自演,编唱抗日新式戏剧,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战热情。

此外,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部队也十分重视根据地新闻文化出版工作的开展,通过创办文艺社团和各种报刊及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争取和团结更多民众支持和援助新四军抗战,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刘少

奇、陈毅的发起和主持下,成立了苏北文化协会和湖海艺文社。以范长江为社长的新华社华中分社,以及新四军新闻发射台先后创建。华中各根据地,新四军军、师、旅各级以及各军分区,都有自己的报刊,仅据1941年夏统计,华中根据地即有部队报纸40余种,油印小报200余种。^[8]

由于普及教育的实施和大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华中根据地人民普遍受到了抗日的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熏陶,在逐渐摆脱了过去的文盲状态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国共党政权的政治认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积极参加根据地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和各项抗日救亡工作。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正确领导下,新四军部队在抗战救亡烽火中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工作,巩固发展了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政府从维护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出发,积极治理,民主施政,领导根据地人民参政议政、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大生产运动、发展文教事业,改善了根据地民主民生状况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赢得了华中地区人民对中国共党政权的认可和拥护,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战热情,从而使日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在新时代,我们仍要与时俱进,创新工作内容和方式方法,大力弘扬和践行革命战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等事业,解决好当下我国社会发展中仍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 [1]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77.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1.
-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5)[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 [4] 刘少奇.中共在敌后做了些什么?[M].吉隆坡:中马出版社,1946:6.
-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29.
-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1.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28.
-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95.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Central China

QU Hong, LIANG Shanshan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ll-out Anti-Japanese War, under the instructions of MAO Zedong, the New Fourth Army troops marched into central China and opened up the anti-Japanese base behind the enemy lines in central China. Under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with the great assistance of the New Fourth Army,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Central China carried out fruitful construction work, including implement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gime of "Triple-Three Systems", reducing rents and interest rates, organizing mass production campaigns, and develop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These measures not only made the people in the central China anti-Japanese base enjoy unprecedented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so a big change and improvement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All these greatly consolidated and developed the central China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And laid a stro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ass foundation to the overall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China Communist party; Huazhong anti-Japanese base; Creation; consolidation

(责任编辑:陆 勇)